

每一个字都与我们的内心相关

□宗仁发

一个读者买一本小说来读,可能有千差万别的理由,但我想最基本的动机还是要读着有意思,也可以说是好玩儿。那什么样的小说能让读者称心如意甚至拍案叫绝呢?首先还是得好好讲故事,“老老实实”讲故事。毛姆说:“故事其实是小说家为拉住读者而扔出的一根性命攸关的救生绳索”,“因为听故事的欲望在人类身上就像对财富的欲望一样根深蒂固”。会不会讲故事对于小说家而言是看家续命的本领。

在阅读王手《退休课》的感想时,我想到前些天看到了王安忆的一篇文章,她写道:“这些年来,有一个最重要的、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对小说的认识越来越朴素。我觉得小说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我曾经写过很多实验性小说,都是很晦涩很暧昧,时空交错,目的不明确,人物面目模糊的故事,因为我很想挣脱故事,摆脱小说的陈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越来越觉得,对我来说,小说的理想很简单,就是讲故事。”王安忆的这段话,不仅仅是她个人创作经验的总结,几乎也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7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几十年写作历程之后的一种共同反思,以及对小说观念的重构。2022年,在评《收获》年度排行榜时,读到王安忆的《五湖四海》,我就很吃惊,反复在想她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个小说,这种写法似乎又回到了“写实路线”上,但仔细想想又没那么简单。在今天若把小说刻意写得“现代”,总有“幼稚”之嫌,可要摆脱掉所谓“现代”的纠缠,绝不是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到底路在何方呢?只能说“路在路上”。

针对近些年小说创作现状,王尧提出要来一场“小说革命”。这也促使王手对自己创作的思考。在《江南》杂志组织的一场研讨上,王手表示:“仔细想想自己这些年来的小说创作,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掉书袋’现象、罗列老物事现象、炫耀另类知识现象、热衷于奇闻逸事现象,以及‘放卫星’式的小题大做现象,也许还不止这些。这些问题如果不是被人揪着想一想,确实还没有引起自己的警觉,还以为这是自己的擅长,甚至还将它作为推动小说进展的一种手段,自鸣得意,津津乐道……”由此来看《退休课》,它应该是一部体现王手近期创作新变化的中短篇小说集。

《二线》貌似漫不经心,实则大有玄机。几个二线干部组成的巡查组,来到一个叫做“六盘”的海岛县巡查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问题,“我”作为一个文联干部也参与其中。“我”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巡查组成员,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这使小说中写到的现实生活更加鲜活真实,无论是市长、村委会主任,还是二线干部,其所思所想小说中纤毫毕现。王手用较多笔墨写到那个在西藏退伍回乡的军人,他的故事几乎就是他的命运。《二线》从表面上看,贴近现实的程度已经接近非虚构了,但那仍是作家的一种叙述圈套,不过是为了让你轻松读下去,其真正的意图在于发现特定



《退休课》,王手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10月

时代里人性的弱点和生活中的种种悖论。

《云中飞天》写退休后寻找乐趣的老伴加入了一个民族舞学习班,学习班里的种种遭遇,使刚退休得到解脱的老伴又搅进了一场民间的“宫斗戏”。这篇老辣之处在于,作家顺着不同年代所跳的不同舞蹈的历史轨迹,勘探出这一群人身上乐于争斗的性格基因。就像鲁迅发现了阿Q精神一样,王手也诊断出了当代人的一种精神窘境。

《永远的托词》乍一看是一篇写亲情的小说,一个到了退休阶段的老人去照顾自己的老父亲。在父亲去世后,老人发现了父亲早年曾写过的剧本手稿,忽然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内心世界并不了解。对于这篇作品,读者可以当作晚辈对长辈的关心不够产生的歉疚和遗憾之情来理解,也可以当作是一篇“审父”的现代小说来读。实际上,父亲一生的经历与时代风云变幻塑造的人格是有残缺的,或者父亲并没有真正“成长”为心理和认知都健全的父亲。

《父亲的牙医》带我们了解了一位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善良的父亲形象。这位父亲甚至对一个医术和职业精神都很差的牙医,也抱有慈悲之心,一边忍受着治疗不当造成的牙齿之痛,一边还对这样的医生心存感激。小说结尾处,有两句“我”与“我”的牙医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在经过比较感受到自己的牙医与父亲的牙医的天壤之别后,“我”好奇地问自己的牙医:“牙齿就这么一点事,它不像五脏六腑,你们读博学的是什么呢?牙医笑了笑,说,学在最小的空间里怎么不动声色地

把事情做好。再换句话说,做好了就和没做的一个样。”这里说的就不只是牙医的道理了。

老年人问题不只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也是文学应该关注的问题。《寻找相靠佬》通过对父母亲晚年状况的叙写,涉及的是生命的脆弱,疾病带给人的痛苦等。同时,通过对父母亲过往的一番搜寻,让人们在生活的幽微处看到一丝人性的光亮。

前些年,王手给《作家》写过一篇小说叫《买匹马怎样》,他在这个小说集里收录了另一篇与马有关的小说《养匹马怎样》。在这篇小说中,他也提到了我当年对《买匹马怎样》的赞赏。的确,他在好多场合都拿王手这篇小说作为“范文”,以此来讨论现实与想象的关系,琢磨写实和先锋该怎么融合。把《养匹马怎样》当作《买匹马怎样》的姊妹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一个文联领导退休后赋闲,又不想做那些没意思的俗事,想到了养匹马或许能算是与众不同的“情怀之举”。于是一番操作,一匹马就神奇地买到了,被他养在一块租来的空地上。不仅如此,一些小学生在女老师的带领下,还专门到这里来参观,了解一些动物知识。当然中间马也出现了点“偶发事件”,还好在我的遮掩下勉强蒙混过关。再后来,这匹马突然失踪了,人们又在纷纷议论这匹马为什么会失踪。有的读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不大好的习惯,就是总要问一篇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其实这样阅读会损失好多无法言说的“言外之意”,而那些“言外之意”可能才是真正的“中心思想”。

《笨狗司派克》和《业余喂猫记》两篇与其说都是写小动物的小说,不如说是把小动物作为一面镜子,让人照照自己,想想人与人与世界上的各种存在之间的关联。最直接的效果是,一只小笨狗和小区里的流浪猫都能够治愈老伴的心理疾病,给人带来慰藉。

追溯起来,王手一开始写小说时就会讲故事,但他在漫长的写作道路上也进行过多种写法的尝试。他在《退休课》里的小说写得很“老实”,老实到了有些笨拙的程度。这是因为小说家心里始终装着读者,绝不想自说自话。也可以说作家还怀着某种期待,对读者的尊重不不仅是态度上的姿态,而且是把读者当作小说的合作者,与读者互动交流,共同完成一个作品。作家走出了文本,读者参与了创作。当然,这种方式也不算是新观念。汪曾祺在评论邓友梅的《烟壶》时这样说:作者在叙述时随时不要忘记对面有个读者,随时要观察读者的反应,他是不是感兴趣,有没有厌烦?有的时候还要征求读者的意见,问问他对所写此事有何感想。写小说,是跟人聊天,而且得相信听你聊天的人是个聪明解事,通情达理,欣赏趣味很高的人,而且他自己就会写小说,写小说的人要诚恳、谦虚,不矜持、不卖弄,对读者十分地尊重,否则,读者会觉得你侮辱了他。

这么来看,《退休课》里的小说读起来多亲切啊。(作者系《作家》主编)

好一朵红棉花

——读凡一平短篇小说《红棉》

□季明刚

患老人,确定不能回家过春节时,红棉跟丈夫编了“节日期间的陪护费从一天180提到了380,外加5000元红包”的善意谎言……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中的红棉形象既高尚,又真实,符合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当她义工般主动照顾老人时,事实上也怀有试工后有可能顺理成章做他陪护的期待,但即使做不成老人的陪护,她依然会这样去做。在离春节还有二十多天时,她曾明确提示老人能否安排亲属来照料,也曾暗示提醒过年陪护能否像例的病患那样提高陪护费。尽管老人都没有答应,但她依然选择留下来照料他。红棉的这份善良,来自故乡村庄的朴实民风和家庭的影响,她经得起病患老人的托付和回信。这是一种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温情和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所写的其他人如拖欠工资酗酒住院的企业老板、产后抑郁的年轻母亲等病患,以及螺蛳孤独被保姆哄骗遭赠、因经济纠纷兄弟失合不相往来等情节,从一个侧面映射了现代社会的多维场景。唯其如此,红棉的纯朴善良才尤为可贵。

就小说结构而言,“文似看山不喜平”,小说围绕核心情节“红棉有没有得到遗产”展开,关键物件是最初出场的那个尼龙拉链包,从老人最初“当个宝”处处提防,到最后主动送给红棉保管并叮嘱等他去世后才能打开,到红棉打开后发现遭赠对象是她本人,却遭到老人身前单位领导是否哄诱设立的质疑,再到大家对遭赠无异后又红棉却主动选择放弃遗产,可谓一波三折,但又丝丝合缝、合情合理,体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

正如一棵伟岸的红棉树那样为老人提供关怀和庇护吗?比如,写春节前住院的病人急于回家团聚时的比喻,“仿佛春节是灵丹妙药,家庭是最好的医院,亲人是最佳的医生,所有的病人都急着回家,或甘愿待在家里”。颇有钱锺书先生《围城》中的譬喻之趣,信手拈来,意味隽永。再比如,写红棉看到遗嘱内容时的比喻,“遗嘱的文字犹如闪电,划过红棉的眼睛,令她炫目;又仿佛鼓槌,敲击她的胸膛,心怦怦跳”。生动准确地写出了红棉的心理状态和可能即将时来运转的命运。又比如,当被老人单位的领导误解质疑时,“红棉一听,脑袋嗡响,像挨了当头一棒。她头重脚轻,手里的手机像一条抓不稳的鱼滑落在地,而她久久都没有将它捡起”,“像一条抓不稳的鱼”暗示了遗产可能得而复失的境遇。

景物描写带来的浪漫主义色彩,是小说结尾的自然升华。与经典的现代白话文小说相比,当前的小说创作中,景物描写越来越稀缺,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大大段的心理描写,乃至读者很难抵达的心灵呓语。《红棉》的景物描写是明快的,风物是清新的。正如结尾所写的,“正月里的上岭村阳光明媚,莺歌燕舞。村中一棵笔直巨大的红棉树顶天立地,映入眼帘。她情不自禁奔向他。红棉靠着红棉树,浮想联翩;红棉抱着红棉树,泪眼涟涟”。她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母亲,想到了自己的人生。“母亲是在这棵红棉树下生的红棉。当时怀着身孕的母亲正在地里劳动,忽然肚子疼痛,羊水破流,于是就近移到红棉树下,成功分娩。那是阳春三月,红棉朵朵向阳开。”景物描写中“红棉”作为树和花意象的凸显和由此带来的情感升华,让整篇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浪漫主义诗性气质。

小说中的红棉,是新时代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人。微光成炬,红棉身上闪烁的善良底色的人性光泽,可亲、可敬、可爱,不仅温暖着她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温润着读者的心灵,生发向上向善的力量。

(作者系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最近,偶然读到2024年第10期《中国作家》上作家凡一平的短篇小说《红棉》,仿佛一束光照亮了案头。温情纯朴的人性之善、清新刚健的生活气息、水到渠成的艺术之美,令人为之一振。在《红棉》中,我读到了久违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新时代小说创作中的有机结合,也再次感受到扎根生活、扎根人民赋予小说创作的实践伟力。

《红棉》讲述的是医院陪护工韦红棉的故事。小学毕业的韦红棉出生在农村,30岁的她舍家弃子到城市医院当陪护。某天在当陪护时,她看到同室邻床的病患老人(退休教授)无人照顾,出于好心而义务照料,后来则成了老人聘请的正式陪护。妻女早亡的老人病情很重,戒备心也很强,他随身携带的尼龙拉链包藏着一个关于遗嘱的秘密——过世后将房产证、银行卡遗赠给生命最后一刻陪护他的人。心善的红棉像对待亲人那样悉心照料老人,给予了他有尊严有温情的临终关怀,成了老人指定的遗产继承人。然而,恪守“非分之福不是福”的红棉,在以继承人身份料理完后事后,却放弃了遗产继承。

小说塑造了红棉这一新时代进城务工妇女形象。从世俗的眼光看,红棉的生活是不幸的,她从一开始就经历了生死磨难,长辈亲人过早离世,为谋生计20多岁的她早早到城里奔波辛劳。但面对苦难生活的馈赠,红棉却回报以善良,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牛一样,吃尽了生活中多棘的草,却仍然挤出牛奶。当红棉原本陪护的因拖欠工资而酗酒住院的老板最后给付陪护费1080元时,她却说给1000就行,80不要了,理由是“我为难,你也难”。当病患老人警惕提防、封闭心灵时,红棉“努力搜刮、编织开心的话作为慰藉、弥补,像从羞涩的囊中极尽所能”。当为了照顾病

徐风善写器物,身在江南,以宜兴紫砂为中心,用文字雕塑出一个器物的世界。他的器物书写系列从早期《壶王》《壶道》《壶殇》起步,再到《布衣壶宗》《花非花》《做壶》,由紫砂壶逐渐深入到江南文化的深处。近年来,他的《江南紫砂荒录》《包浆》将器物与江南深刻地牵连在一起,写出了器物深处的心灵秘史与江南神韵。徐风书写紫砂多年,变换多种文体,视角却始终对准江南时光流转中的器物,以及器物背后的文化与悲欢。《江南器物志》作为徐风的最新力作,将书写的重心由紫砂扩展至江南诸器,通过名物考证和文学想象,在器物流转与人事交织中,重新照见了江南意韵,并对当下社会与文化现实进行了深切思索。

江南在秦汉时期被称为“江东”或“江左”。隋唐之后,江南地区富庶繁华,文学书写逐渐增多。近代以来,江南文学书写在郁达夫、朱自清、戴望舒、叶兆言、苏童、格非等笔下不断丰富,以新的时代精神赋予江南新的文化内涵。在层叠累积的文学写作中,江南从一个地理空间被塑造为一整套文化意象。

文学想象和名物考证并举,是徐风书写江南的基本路径。他以“器隐镇”这一虚构场域为叙事核心,既给予文本必要的想象自由,从而实现艺术再造,又在细节上大量借助地方志、口述史与实地观察的考证,使得虚构并不流于抽象或空泛,而是具备可验证的物质感与历史感。书中诸篇如《瓦片翻身记》《龙骨水车》《扫地成僧》《一品当朝锅》等,通过对器物的制作工艺、使用触感、传承脉络等细节的描写,呈现时间与人际关系的叠加轨迹;这些文本细节不仅是叙事的美学资源,也是作者考证功夫的显露。竹编考篮的编织技法,车水巷农具的名称与使用语境,酒瓶、香烟、古画在民俗语境中的变迁等,都被置于可读且可考的语境中。这样的写作策略,有效避免了纪实文献的枯燥与纯文学虚构的轻薄。

《江南器物志》中,器隐镇成为典型化了的江南小镇,虽不切实存在,但又处处映照着江南的影子。当读者步入器隐镇,便走进了“真江南”。该书的序篇如此描述道:“它坐落在太湖西岸。原住民们喜欢说这里最江南,日子慢吞吞,挣钱哗啦啦。口音不硬不软,菜肴不甜不咸,做事不急不躁。人情通透,世故练达,都似水磨粉团子,一口粘住牙,糯里带点韧。米酒甜兮兮的,饭菜热络络的。”读者未及见器隐镇之景,却先听见了器隐镇之声,在“慢吞吞”“哗啦啦”“甜兮兮”“热络络”所构成的“吴侬软语”中,观众已然领略了江南风情。而后作者带领观众从水路进镇,乘着“两头尖翘,一丈余长,宽三尺,无篷有坐,舱板油亮”的“小划子船”,在摇摇晃晃、弯弯曲曲的水道中,先后经历了大人巷、学前巷、车水巷、伙头巷、百搭巷、百工巷等,器隐镇的地图由此徐徐展开。大人巷威风,住着告老还乡的徐阎老,当地大儒于鹤,还有状元周延儒,举人汤效祖,二人都因科举而“瓦片翻身”由鸡笼巷搬入大人巷;车水巷繁忙,聚集着镇郊的农户、杂工、小贩,精通农事、农谚的木匠郑老大即居住于此;百搭巷快活,古玩店和当铺多聚于此,其中宏泰当铺的大掌柜袁心舟尤以“一双会看老物件的鹰眼”在此间混得风生水起……最终,徐风构建出了器隐镇三街通九巷的空间坐标,更写出了江南温润的风土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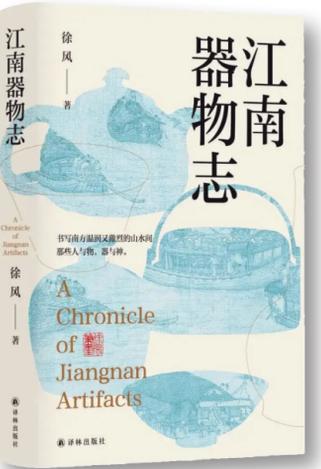
《江南器物志》的器物书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博物志写法,而是将博物馆展柜里被凝视的“古物”重新交还生活。《合欢桌》中,这张精美装饰的楠木雕花桌子,由两张榫卯结构的半圆桌拼合而成,丈夫在时即拼合在一起,象征圆满,丈夫不在时仅留另一半于堂屋,客人来时即知男主人不在家,于是“几句话说完,掉头就走”。此后,合欢桌经历被当、失踪、追回等波折,找回此桌成为汪素娥证明自身贞洁的关键。《瓦片翻身记》中,作为汤效祖恩师与未来岳丈的颜文泰,他在汤效祖赴金陵参加乡试前特意准备了“几样路上必备的器物”:折叠油灯、青云剑、砚台与竹编考篮。油灯可夜读照卷,长剑可防身辟邪,砚台堪润笔锋,考篮则可收纳文房,同时它们也表明一种档次与身价,为汤效祖添一份雍容恬淡的气度。在汤效祖中举后,这四件器物随即成为师门情谊与人生期望的见证。在《得义楼》中,毛无忌家道中落,临终仍念及分家所得供春壶。此壶为紫砂鼻祖供春亲制,乃其最后资产。偶然间,毛无忌与得义楼老板钱逢时相识,二人相约:以壶抵茶资,日来啜茶,壶由店主保管把玩,惟不售不赠。此后,毛无忌常来茶馆饮茶,饮毕即去,钱逢时则以此壶招徕顾客,生意兴隆。后毛无忌忽然病逝,钱逢时仍日守约,将供春壶密藏于租坊。半年后,毛无忌弟弟以毛无忌往日喝茶常用的唐盏为证,要求依旧兄兄长此前一般来茶馆饮茶,并不索壶。钱逢时见此潸然泪下,引之人租坊,还壶共悼。当这些“古物”跌回灶间、书案与茶馆,恢复其曾被手温捂热、被油灯照亮、被茶汤浸渍的日常身份,它们的骨气与灵光才得以彰显。

《江南器物志》中的江南,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江南水乡,更是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原乡。徐风希望用文字搭建与还原一座烟火漫卷的江南古镇,以呈现它气象万千的日常肌理。但在书写江南的过程中,他也发现:科举、稼穡、节庆、风俗、嫁娶、庭院、舟车、服饰……都是中国文化语境里永不破败的内身;俗世生活中的菜单、食谱、药方、茶道、风水、方术、古玩、字画,亦是中国人精魂里不可磨灭的诸般星宿。《瓦片翻身记》浓缩了中国人关于考学的生命体验:汤效祖的乡试被全家人寄予厚望,在母亲的严厉要求、岳父的殷殷嘱托、未婚妻的体贴关心下,最终有惊无险顺利中举。《龙骨水车》写出了中国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结:郑龙大与土地联系密切,他感知节气变化并吆喝着不同的农谚,在声声吆喝中度过了数十个寒来暑往,最终九十九岁高龄死在了自己所热爱的土地上。《雀仙桥》写出了中国人的团结精神与对中药的集体记忆:许吉安患急温世,在疫症中为镇民熬药提神,草药的氤氲气息在器隐镇的各条巷子里游弋,这些人口清苦涩嘴的中药最终帮助许多人扛过了这场瘟疫。这些故事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它们不仅属于器隐镇,也属于每一个曾被相似经验浸润的中国人。

《江南器物志》中的器物书写,是对江南往昔生活方式的怀旧回溯,更是一种面向当下的文化反思。徐风笔下的器物,既承载了江南的温润气息,也暗含了对当下消费主义的温和抵抗: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生活并非建立在占有之上,而在于体察、珍惜与共处。当他将写作比作“一场慢戏”,那种不疾不徐、以匠心对抗浮躁的姿态,恰恰为当代生活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松弛与秩序感。在回望传统的同时,徐风用文字为我们指向了另一种现代性——一种由器物与人心共同锻造、在日常生活中重拾尊严与温度的生活方式。

综观徐风的写作脉络,《江南器物志》既是其“器物书写”的一次集大成,也是当代“江南书写”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当代“江南书写”的语境中,该作品以器物为切口,以生活为经纬,为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叙事活力与思想深度。可以说,它以其兼具文学温度与文化厚度的笔法,为“如何书写江南”这一持续的文学命题,提供了新的叙事路径与美学范式。

(作者张娟系东南大学教授、陈能泳系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江南器物志》,徐风著,译林出版社,2025年7月

器物里的江南 江南里的中国

——读徐风《江南器物志》
□张娟 陈能泳

